

读史札记

萧何为何独重“律令图书”

□ 滴水水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初读《史记·萧相国世家》时，对萧何进入咸阳的作为有点不解。那个时代，天下纷乱，很多仗打的目的就是争夺地盘、抢夺金帛财物。刘邦是这样，项羽也是这样。“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项羽进咸阳，抢光财宝，一把火把咸阳烧了。萧何为什么随着饿狼般的大军进入咸阳后，不去抢夺金帛财物，独去收取“律令图书藏之”？深入研读汉代历史后，才明白萧何此举的英明，从心底里敬佩这位大汉帝国厥功至伟的战略家、政治家。

萧何收藏的不是一般的律令图书，而是秦王朝的法律文书、地理图册、户籍档案、税赋账簿等等。常人眼里金帛财物是宝，而萧何眼里这些“律令图书”是宝中之宝，它们为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司马迁用短短数语，归纳了“何具得秦图书”的作用。大家都知道，项羽违背楚怀王当初的约定，不给刘邦做关中王，而是把他封到了巴、蜀。张良走项伯的后门，要来了汉中，于是刘邦当了汉中王。项羽范增以为，巴蜀汉中都是不毛之地，不要多久就可以灭掉刘邦。谁知刘邦嘴里大骂项羽背信，暗地里却乐得去当汉中王。自己的实力斗不了项羽，躲进巴蜀安全。萧何从“律令图书”中得知，这些地方不但无穷，而且还富得流油。因为它们未遭战乱。司马错平蜀后，又带去了铁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大家还都知道，刘邦和项羽曾在荥阳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项羽要烹刘邦父亲而刘邦要分一杯羹的典故就发生在那场拉锯战中。刘邦被消耗得精疲力尽。山穷水尽之际，秦朝的“律令图书”让刘邦团队柳暗花明。他和他的谋士们从秦国详细的地理图册中找到了办法，开辟北方战场和南方战场，三面迂回楚国。于是，韩信去赵代，刘贾走南路，随何去九江，刘邦自己正面阻击项羽。在这之前，军神韩信没有打过大战。他仔细研究秦朝的地图，开始了收复关中的“暗渡陈仓”之战，降服了两个秦王，出兵打下韩国，又回头把章邯圈死在废丘。一个关外汉，没有秦朝的地图资料，他是无法清楚关中地形城池和关口而又如此运用自如的。除了韩信这一路实现战略意图外，南路刘贾也连战皆捷。项羽被三路打得身心俱疲，不想打了，划鸿沟讲和。

纵观楚汉相争，当初刘邦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刘邦被项羽打得狼狈不堪的许多历史镜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后来翻盘了。是项羽不能打了？是刘邦突然特别能打了？当然不是。秦的“律令图书”让汉军打得布局精巧，神出鬼没、收放自如，犹有神助，最终让项羽自刎了。

萧何收藏的“律令图书”，不但让刘邦夺取了天下，而且让汉王朝根基稳固，天下安然。史称“汉承秦制”，此话何意，我认为汉承的就是秦的“律令图书”。“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黜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萧何结合汉初天下大势和百姓民愿，研究秦王朝的“律令”，在比较完备的秦律基础上，删减、增补而制定汉律，即史上著名的“汉律九章”，使大汉王朝的法律系统化、条理化、规范化。此律对汉代乃至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建设，具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当初跟刘邦一起打起咸阳的汉初名臣还有曹参、周勃、樊哙、张良等等，为何萧何独去收藏秦王朝的“律令图书”？这就涉及到一个人的政治智慧和眼界了。汉初名臣都是汉王朝的栋梁之才，但萧何可谓栋梁中的栋梁。首先，他的视野广阔。虽然秦末天下大乱，但他很清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地同域，量同衡，币同形”，华夏智慧集大成，形成了最完备、最系统的国家治理体系，这是秦以前绝无仅有的，是最宝贵的财富。其次，他目光远大。秦末想当天下帝皇的诸侯几十个。项羽借楚怀王之名分封的诸侯就有十八路。最后独独刘邦君临天下。萧何的政治目光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这种超乎常人的政治眼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收秦“律令图书藏之”。这个巨大的财富帮刘邦打败了项羽，赢得了天下；这个巨大的财富也帮刘邦迅速安定了大汉王朝；不止于此，它还整个影响了汉王朝407年。“文景之治”“汉武帝世”“孝宣之治”“光武中兴”“明章之治”“永元之隆”，汉代六大盛世中，我们都能找到借鉴秦“律令图书”的影子。

后人研究萧何的文章，数以万计。我仍然要反刍萧何独藏秦“律令图书”的史事，是想说，宝物于人类，有一人之宝，有一国之宝。人人皆喜之，有志之士要重治国之宝、社稷之宝。一人之宝，即使终身受益，乃至惠及子孙，终有化作尘埃之日。而一国之宝，让天下受益，使苍生获利，永远是有生命的。



网传张玉书画像

《康熙字典》是一部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大型字典，总阅官张玉书是康熙朝的高官，他虽非丹阳人，却把长眠地选在了运河支流香草河边的丹阳市司徒镇全州尤区村。张玉书（1642—1711），字素存，号润甫，镇江丹徒人。他出生在明末一大户人家。其父张九徵（1617—1684）年轻时是江南名士，明亡后于顺治二年（1645）应朝廷举办的第一次乡试列第一名，两年后中进士，入朝为官，任吏部行人司、郎中、河南按察金事等职。张九徵生有五子，有四个儿子考中进士，长子张玉裁（1639—1674）中康熙六年（1667）榜眼。次子张玉书顺治十四年（1656）科举人，顺治十八年（1660）中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内閣学



《康熙字典》

士、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起，张玉书入阁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为官多年，张玉书在辅佐康熙皇帝统一全国、安定民生、建设国家等方面做了不少好事。河道总督靳辅主持的治理黄河工程被人弹劾，并说靳辅与纳兰明珠结党营私，私分河银。康熙帝责成张玉书调查此事。

他深入下层，多方取证核实，秉公陈奏，终于使靳辅治河功过得以澄清。康熙帝又责成他调查杭州驻防清兵扰民一案，经他核实取证，处理了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有关人员。

张玉书是清朝名臣，为维护国家统一，康熙帝曾三次出塞亲征噶尔丹，张玉书均随同左右，成为随征的唯一汉臣。在他的参与下，康熙帝采取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战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平息叛乱的决定性胜利。班师后，朝廷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典礼，张玉书率领百官上贺。

张玉书曾多次视察黄河、淮河、运河河口，向康熙帝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均被采纳。尤其是康熙帝巡视江苏丹阳时，当地官员请求治河



《佩文韵府》

并提出了具体方案。康熙帝责成张玉书与河道总督共同审核。他们亲临现场，逐项落实。康熙帝十分满意，任命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这个官职相当于宰相了。这或许是张玉书死后葬于丹阳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玉书工古文辞，学问渊博，他还编纂了不少典籍，如《明史》一度由他主持编纂，其他如《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治河方略》《佩文韵府》等都由他任总裁。著有《张文贞集》十二卷，《清史列传》行于世。

年届七十时，张玉书以病乞休，康熙帝下旨慰留，只得作罢。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张玉书随侍康熙帝巡幸热河，病复发。康熙立即派御医治疗，医治无效，五月十八日，逝世于热河，终年70岁。

张玉书猝然病逝塞外，康熙帝十分惋惜，诏令内务府监制棺槨，沿途拔夫护送回京。又命大学士温达会同翰林院官员、内务府总管前往吊唁，遣皇三子诚亲王奠茶，赐带金千两以为丧葬之用。康熙帝还亲书挽联挽诗和碑文，加赠太子太保衔，谥号“文贞”。特允张玉书弟张恕可离职迎丧，又遣行人护送归里。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是有清一代大臣谢世后未曾

远去的乡间“河簖”

□ 杨汉祥



时下说到捕鱼器具，人们一定想到鱼网、钓竿、鱼叉、鱼笼，等等。其实际除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原始而又大型的捕鱼器具，那就是“河簖”。如今这种安插在河中的“竹木组合体”几乎彻底绝迹，然而在四五十年前我们镇江各地乡间可谓随处可见，而且其捕鱼效果非常好。

所谓“河簖”，是一种由细竹排、木桩、提笼等物件组合后插入河中，形成一排形似水中的竹篱笆，其作用是拦截河中过往鱼虾等水产品，并有效将其捕获。“河簖”虽然属于一种土法捕鱼“装置”，但从事这一“营生”的人家最起码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住宅必须紧靠河边，这样才能方便日常维护宅旁的“河簖”；也有利于随时从中取获鱼、蟹、虾之类的水产品；二是选定插簖的河道必须是活水，河中野生鱼、虾、蟹等也要多，否则“投入”后则少有“产出”；三是家中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因为插“簖”所需不少毛竹、木桩、铁丝、棕绳包括大木盆或小木船等物件，而购买这些物件都要花钱；四是家中必须有一两个或更多的壮劳力，因为要经营好“河簖”，使之产生好的效益必须有足够的人手。

安插“河簖”之前，先在河道两岸间的水中每隔三米左右打入一根粗瓷大碗口般粗的木桩，接着把用细毛竹条与棕绳编成的一块块竹排，按木桩的线路依次插入河底淤泥中，同时将其与木桩紧靠并绑牢。至于所插的竹排顶部要略高出水面，否则就起不到“拦截”作用。插入的竹排每隔一米左右要留出一个尺把宽的空档，然后把准备好的竹提笼嵌入空档，并用铁丝将其与竹排固定。所谓竹提笼是用竹篾编成，形状像一只加长型的大鱼篓，其最宽处直径一尺左右，高度跟竹排一样。另外，在提笼前后两面各锯开上下两个直径为半尺左右的圆口，其中下边的两个圆口必须在提笼最下端（主要为引诱螃蟹爬入），然后把一个漏斗状的竹篾编织物紧紧地嵌入该圆口，而这“竹漏斗”的上口要对外并全部没人水中，被拦截的鱼、虾、蟹等水产品一旦

到了“竹漏斗”上口边，便误认为是出口，以至很容易通过“竹漏斗”上口进入提笼，由于“竹漏斗”下口狭小又有一些弹性，鱼、虾、蟹等水产品一旦穿过“竹漏斗”下口进入了提笼，再想从中逃出来则几乎不可能。

有了“河簖”，主家除了平时养护外，还要定时划着大木盆或小木船去各个提笼处收取渔获。一般每天收取一两次，收取时先把固定提笼的铁丝松开，接着将提出水面的提笼倒扣在大木盆里或船舱里，然后将提笼往上一提，里边的鱼、虾、蟹等水产品就从提笼上口全部倒出，清空后的提笼随即按原样再嵌入原处并固定好，等待下一次再去收取。当全部提笼倒过一遍后，主家可以满载而归了。接着便在岸边将鱼、虾、蟹等水产品分拣后，装入固定在河沿水中的各个鱼篓或网兜里，以便在现场出售，也可以积存多了拿到集市上出售。当年我家附近有一个“河簖”，平时收获的各类水产品也多。我家每逢要改善伙食就去他家购买，那儿的水产不仅种类多，而且还格外新鲜。

当时的“河簖”一般都插在不通航船只的河道上，如果非要在通航船的河道上插“河簖”，必须按当时有关部门规定，在河中央留出一段可容纳一条较大船过往的空档，该空档处不打木桩、不插竹排，只是紧紧地插上一排弹性十足的薄毛竹片，在水下能起到阻挡鱼蟹等水产品的作用，但当船只通过时，这些毛竹片就被压入船底，等船过后毛竹片再抬起头并恢复原状。至于机帆船过往时也是如此，但船主一定关停船上机器。否则会损坏毛竹片，而且弄不好还损坏船底的螺旋桨。

后来，由于各地水产品养殖业兴起，河中野生鱼、虾、蟹之类水产品逐渐减少，加上人们捕鱼、捞虾、捉蟹的器具以及方法日趋先进，尤其后来各地交通运输、水利等部门不允许在河中私筑各种影响航行与水利的设施，以至“河簖”也变得越来越少，最终被彻底淘汰，所以如今即使在我们这种苏南水乡的农村，也很难再见“河簖”的踪迹了。

冬尽春生吟大寒

□ 钱续坤

民谚云：“大寒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马上将迎来中国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授时通考·天时》引《三礼义宗》云：“大寒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谓之大……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望文思义，大寒应该冷于小寒，这在我国北方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处处呈现出冰天雪地、天寒地冻的严寒景象；好在大寒过后，又将迎来新的节气轮回，故有诗赞曰：“人间至此冬色尽，惟愿新年胜旧年。”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大寒有三候：“一候鸡始乳，二候征鸟厉疾，三候水泽腹坚。”寥寥数语，便将古人认为最能代表大寒节气的自然现象悉数道出，其中“水泽腹坚”更是说明了冷之最与寒之甚。北宋诗人邵雍《大寒吟》为此描述云：“旧雪未及消，新雪又拥户。阶前冻银床，檐头冰钟乳。清日无光辉，烈风正号怒。人口各有舌，言语不能吐。”人即使有舌头，也被冻得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冬天，怎一个“寒”字了得！

既然天气如此寒冷，那该做些什么呢？北宋著名画家、诗人文同选择的是与朋友谈心和读书：“宿鸟惊飞断雁号，独凭幽几静尘劳。风鸣北户霜威重，云压南山雪意高。少睡始知茶效力，大寒须遣酒争豪。砚冰已合灯花老，犹对群书拥敝袍。”（《和仲蒙夜坐》）只是在苦读群书时，由于夜的寒冷，不得不裹紧破旧的棉袍。当然，诗人也提出了很好的御寒方法：“大寒须遣酒争豪”，这与南宋诗人方回的想法不谋而合：“大寒岂可无杯酒，欲致多多恨未能。”遗憾的是，两人都没有能力买回太多的酒，所以要想熬过这大寒节气，实在是太难了。

唐代的元稹就迥乎有别了，他毕竟做过宰相，腊酒盈杯，金炉炭温，一派富贵相。《咏廿四气诗大寒十二月》中是这样形容的：“腊酒自盈樽，金炉兽炭温。大寒宜近火，无事莫开门。冬与春交替，星周月运存？明朝换新律，梅柳待阳春。”而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则是白居易，尽管他们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诗歌运动，但是所关注的对象有所不同，香山居士所描述的对象多为底层的普通百姓，其《村居苦寒》云：“回观村间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诗中着重使用对比手法，把农民的穷苦境况与自己的温饱作对比，从“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的反问与自责中，凸现出作者关心人民疾苦的优良品格。

最值得称道的还有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其《大寒出江陵西门》云：“平明羸马出西门，淡日寒云久吐吞。醉面冲风惊易醒，重裘藏手取微温。纷纷狐兔投深莽，点点牛羊散远村。不为山川多感慨，穷游子自销魂。”诗中的叠字“纷纷”“点点”，不仅具有状形、状声、状色等作用，所修饰的人、事、物、景能生动鲜活地把意象具体化与可感化。而且更加衬托出气候的严冷与环境的恶劣，以及作者忧国忧民的可贵情怀。

大寒后，冬去春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正迈着轻盈的脚步款款走来。

